

“负责任”的好声音

□ 羽哲

“五一”前夕,科技界再次传来“好声音”,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提出“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这一倡议在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进程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能带来安全风险”。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代表了主流的“科学共同体”声音,这一表态实为不易,使全社会向更加理性、客观地讨论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科学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既可以为人带来福祉,也可能造成风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在发达国家已进行多年,而在我国,政府现阶段更多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的“推进”作用,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关于“技术风险”的讨论。近年来一些地方涉及环境风险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出现,新兴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公民意识”不断成熟,使得有关“技术风险”的讨论显得更加迫切,这不仅仅是更有效地向公众“普及科技知识”的问题,而且也要使科学技术在实现“自身发展”和“服务国家发展”目标的同时,如何更好与社会公众的需求相适应。

否则,政府大笔投入取得的科技成果,由于公众不理解、不接受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应用推广,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就无从实现。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倡议突出强调了在转基因技术研发中的“负责任”,除了科研活动自身的规范和要求之外,还特别强调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倡议中提到的决策咨询、科学传播、科技伦理教育、规避利益冲突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不唯转基因技术发展所独有,是所有科研从业者都应当遵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一个“职业声望”和“社会公信力”都比较高的社会群体,其责任不仅仅是为“社会服务”,更重要的是凭借自身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向社会表达公正客观理性的立场和声音,为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架设桥梁。

在这一过程中,困难的是如何处理好科研活动自身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科研活动的“价值无涉”并不代表科学共同体就天然的客观公正。科学家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不能成为“自身利益”的放大器,不能成为“政府利益”的传声筒,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实现这一点在当今中国面临重重困难,这不仅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问题,还面临发展大环境和现有利益格局的制约。

无论如何,中科院关于转基因技术研发的倡议,是科学共同体的一次“负责任”的发声,我们期待这样的“好声音”越来越多。



灾难报道更需专业精神

□ 杨雪

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芦山地震撕裂了祖国山河,也撕开了我们尚未愈合的伤口。又是地震!又是四川!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急切地关心地震灾区的救援抢险情况,焦虑之中带有几分无所适从。虽已默念多次,却忍不住再道一声:“加油!”

心,昭然若揭。还有一类报道,也让人看着无奈。在地震发生一小时后,雅安市人民医院的车棚里降生了一个婴儿;尽管余震不断,荣经县城一对新人如期举行了婚礼;新郎去了一线救援,留下新娘独自完成婚礼……是不是都是似曾相识的“桥段”?因为在汶川地震中都有过类似报道。而再往前想,抗击非典,抗洪救灾,也都大同小异。

五年前的伤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正是有了五年前的救援经验和教训,芦山地震在组织救援抢险工作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快速反应,组织部署,科学施救,考虑周全,民间参与。更值得肯定的是,微博微信的传播信息和集结舆论的优越性全面显现,例如某些高速公路在震后仍不自觉地继续收费,就在网友的一片喝斥声中做出了调整。

相比之下,这次地震中的一些媒体表现就有些差强人意,透着一丝不和谐,总让人心里不太舒服。地震发生后,正在准备婚礼的主播穿着婚纱就奔赴现场出镜报道,惹来不小的争议。但无论她是在地震后立刻前往一线报道,还是完成婚礼后才安排去的一线,我相信,换件衣服的时间绝对能挤出来,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作为之

今天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报道还沿用着一贯传统的“煽情”根本无法符合公众的口味。我们并不那么想知道在这样悲情的底色中又有多少新生儿降生,又有多少新人完婚,我们更关心的是又救出多少人,灾区的生活和医疗物资够不够用,对次生灾害的监测到不到位等等具有建设性的信息。

传统媒体“干活”的方式若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只能公然在公众面前暴露出自己的不专业。而今天的公众,从任何一个时期都“刁钻”,有着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被动接受“煽情”的灌输。所以,我们的媒体是时候好好自省了,当然,这也需要顶层设计师多费苦心。

成功标准同质化 折射教育之殇

□ 吴佳坤

北大陆步轩卖猪肉本是“炒冷饭”式的旧新闻。自2003年他被媒体报道开始,社会上围绕他的争议之声就从未消停。前不久,他重返北大向大学生演讲时,认为自己给母校丢了脸,抹黑了。此话一出,再次引发人们对于什么才算是成功的广泛讨论。

陆步轩,这位曾经的文科状元,大学毕业后在小县城当了职业屠夫。在世俗的眼光里,这样的职业规划无疑与北大才子的成功相差甚远。在一定程度上,陆步轩的“自卑”源于社会上对于功名成就的潜意识。无论人们在公开场合如何宣称行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云云,可是坦率地讲,国人对于成功的判断标准永远离不开权力和金钱这两个原点,“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人并不罕见。

对于成功的这般认识与中国教育体系不无关系。不客气地说,在权力和金钱的指挥棒下,自小学至大学几乎所有教育阶段的价值导向呈现出惊人的同质化。小学要学奥数,中学要进重点班,大学要考985名校。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一个优秀学生的标准,才能为以后的成功人生打下基础。

正如温水中的青蛙,莘莘学子从小浸润在这种教育理念里而不自觉。不仅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就是在默默无闻的普通高校里,大多数“正常”学生成功的目标是中央各部委、垄断央企、国有银行这样充斥着权力与金钱的“黄金地段”。毕业后能进入这些集聚地的人,常常带着家长的骄傲,同学的嫉妒,以及竞争者的痛恨。在前一段时间,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几十名研究生为了取得事业编制而选择应聘环卫工人。有的人甚至声称自己“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对于关心步轩命运的人来说,陆步轩似乎有了一个较为完美的结果。在经历长期以卖肉为生的职业生涯后,他最终选择在县档案馆进行县志的编纂工作,有了编制。陆步轩的遭遇并非孤例,同质化的成功标准是功利化教育体系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那么,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一千个人眼里,或许会有一千种答案。较以前相比,当代社会更为开放和多元,成功的途径和机遇多了许多,标新立异的个性化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成功准则。其实,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是单调无趣的内在,这个内在的核心是对于权力和资本的追逐和占有。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核心居然被许多人所默许,并且构成了中国社会所谓“主流”的成功评价体系。在我看来,这些刻意迎合社会评价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内心,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了解需求 是科学救灾的必要前提

□ 赵延东

在汶川地震发生五年后,又一场地震袭击了芦山。应该说,这五年间政府和社会都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灾害应对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震灾,整个救援工作与五年前相比显得更加及时、有效。但从科学救灾的角度看,仍然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

此次芦山地震中,我们又看到大量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芦山县城,县城人满为患,物资堆积如山,但与此同时,一些受灾地区仍然缺乏粮食,受灾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幕与五年前何其相似?五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没有改观?造成这一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受灾群众的需求信息了解不全面、不准确,导致救援力量与群众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灾害救援的目的是帮助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只有及时、准确地了解受灾者的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救援工作,保证救灾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为更好地了解受灾者的需求情况,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救灾实践中发展出一些

较为系统的“灾后需求评估”方法,美国国际开发援助署(USAID)、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UNDAC)和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等机构和组织都开发出较为成熟的灾害早期快速需求评估的工具,在灾害发生后的一两个星期内迅速对受灾民众开展调查,了解其基本生活需求。

由于此类需求评估是在对整个受灾地区民众的抽样调查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覆盖范围的全面性和需求信息的准确性,能较好地解决灾后紧急救援阶段需求信息不明的问题。在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2008年缅甸强热带风暴灾害发生后,当地政府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展了快速需求评估,大大提高了救灾工作的效率。

我国现行的救灾体系中,已经有一套通过基层政权逐级上报的灾害需求信息传递体系,即通过村、社区等基层政权收集灾损情况和群众的需求信息后,逐级上报给上级机关,然后由上级机关根据这些信息来分配救灾物资并逐级发放。但这种需求信息的传递方式存在信息传递速度较慢、效率低下、准确性差

的缺点。经常会出现受灾严重地区的干部未能及时将灾情信息上报,或是上报信息的准确性受到怀疑、无法引起上级重视的情况,结果导致了一些救灾工作“盲区”的出现。

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在我国建立起一套快速、系统、全面地收集受灾群众需求信息的系统,在灾害发生后紧急响应,利用面访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先进调查手段,迅速了解受灾民众的受灾情况及基本需求,作为政府和NGO组织开展灾后紧急救援工作的指南。

不仅如此,当前灾区的工作重点已经由紧急救援转向安置和恢复重建,居民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需求信息的收集工作也要随着灾后救援工作重点的变化而持续开展。在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就在灾后一个半月的时间点上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需求调查,了解灾区居民对恢复重建的政策需求,为灾区重建规划的制订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可见,充分准确地了解灾区居民的需求是科学救灾的前提,这一工作应贯穿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全过程。

非批量需求提供者: 社会组织在应对地震灾害中的角色

□ 卢阳旭

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芦山又发生了强烈地震。

两次灾害后,社会组织(NGO)活跃的身影和围绕它的各种讨论,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组织在应对地震灾害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五年后,NGO更专注于满足灾区大量的非批量需求,显示了它们更清楚的角色定位。

作为一种灾害,地震对社会常规生产、生活造成扰动和破坏。重回正常轨道,需要大量物质、非物质的投入。既包括大规模、同质化的批量需求,也包括小规模、异质化的非批量需求。灾害应对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

与非批量需求相比,批量需求通常有更高的可见性,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资源投入。地震灾害后,房屋、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产业重建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大量政府、民间资金投入这些领域。但对诸如社区文化、社区生计等可见性较低的非批量需求,人们给予的关注通常相对较少。

与此同时,批量需求和非批量需求的差

异,也体现在资源投入上。满足批量需求,更多是资金投入问题,而非批量需求则更需专业技能、时间和人力投入。足够的资金投入,能较好地解决住房、基础设施、产业重建等问题。但社区陪伴、整理/开发社区文化资源等非批量需求,则更倚赖时间和耐心的投入和更差异化的处理方式。

灾后阶段分布差异,也是批量需求和非批量需求间的显著差异。在紧急救援阶段,道路抢修、快速救援、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等;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过渡安置阶段的卫生防疫、受灾居民基本生活补贴;灾后重建阶段的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住房重建、产业恢复重建等,都是灾后不同阶段的需求。政府在装备、人员、技术、物资储备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最有能力满足上述需求。

与之相对,非批量需求,主要出现在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总体来说,灾区的非批量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专业化社工服务(主要关注心理健康、特殊群体需求)、环境保护(主要关注社区卫生、生态

安全和保护)、社区服务(比如集中安置区社会融合问题、少数民族文化整理和保护等)和社区生计(比如开发社区公益旅游、社区特色商品等)。

满足上述需求,需要专业技能支持,更需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投入。国内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粗壮有力的手,很难干好这种“绣花”的细活,NGO更具有技能和成本优势,是更合适的需求提供者。

NGO关注非批量需求的供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甩包袱”,对非批量需求“不闻不问”。恰恰相反,政府应为NGO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注册、税收减免、政府购买服务等),鼓励NGO满足各种非批量需求。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说明中明确指出,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四类社会组织。这有利于增加上述类目的NGO的存量,也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NGO自身能力和服务水平。除了满足常规的需求外,也为满足灾害情境下各种非批量需求,提供更好的保障。可谓,家中自有粮,心中不慌。

解决“打车难”的改革样本

□ 木慧

近日,为解决好北京“打车难”的问题,有关部门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解决北京“打车难”,是个典型的“改革样本”,既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竞争和垄断关系问题,还有“利益集团”和利益分配问题。近期出台的诸多新政,确实有不少新的思路和亮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政府部门决策的依据问题。有关部门提出要有“适度增加运力”。但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有着2000万常住人口,而交通状况相当糟糕的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出租车才合适?现有的运力到底使用了几成?有关部门是否对此进行过测算?一个极端的问题是,现在在6万多辆出租车肯定不够用吗?至少目前没有披露过类似研究报告。此外,“电召服务办法”规定,“的哥”要确保每天执行2单电话叫车业务,为什么不

是1次或者10次,这是个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决策缺乏科学、准确的研究基础和依据,是当下政府部门的通病,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习惯于在决策前需要设定必要的研究和咨询程序。这样的改革措施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恐怕连决策者自身心里都没有数。

其次,是利益机制问题。解决“打车难”的问题涉及政府、出租车公司、“的哥”、消费者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讲,由于高层的过问,此次解决“打车难”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尽最大可能把这项“政治任务”完成好,是政府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改革是否能够兼顾其他各方利益,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

先是人为地把出租车公司定位为“微利”,实在让人想不通“微利”与解决“打车难”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可能拐五六个弯

才会挂上点钩。与此同时,政府“困不住”的手再次发力,实行出租车总量的“年度动态调控”,新增运力实行“特许经营”,对违规公司和“的哥”处罚更加严厉,不但没有“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之手反而越伸越长。一系列监督、考核、评估、许可的后续,将会隐藏多少“寻租”机会?

至少从目前的措施来看,“的哥”的利益没有被重视,“涨价”可能带来打客人数量减少的“替代效应”,一直是“的哥”们所担心的,层层加码的考核制度将给“的哥”运营带来更多的压力。实行“电召”,需要配备额外的设备,钱由谁出,政府是否有补贴?弄不好这些额外负担都由“的哥”们来扛。

最后,是改革措施的针对性问题。政府部门的一系列措施,看似严密、系统、环环相扣,“标本兼治”,但实际上是“局部有恙,全身吃药”。切莫忘记,这次改革的核心是解

决“打车难”,而不是改革北京出租车管理运营机制。经常在北京打车的人都有感觉,焦点在于上下班高峰期“打车难”,平时打车并不难。当然,如果要讲清楚,得进行一定规模的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如此一来,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价格机制,实行“高峰期价格”,使价格高到让“的哥”们有足够动力在高峰期“拉活”,而消费者负担增加得也不要太多。殊不知,在高峰期打车的人群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因为“尽快到达目的地”是他们最大化的效用。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诸多的约束条件下,解决好“打车难”这个“小鲜”确实不易,政府部门要做出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决策,确实需要“大智慧”。需要提醒决策者的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旨意是“迅速见效”,如果短期内见不到成效,纵然有再好的“顶层设计”,其后果也将是令人堪忧的。

提升学术道德的三种模式

□ 李侠

近年来,随着各类学术不端事件的频频曝光,以及如雾霾般蔓延于学术界的浮躁氛围,已经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界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究其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作为科研环境的学术道德水准呈现快速下滑的趋势,如果这种态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提升科技界与科技共同体的创新热情与活力就是一句空话。呼唤学术道德重建已成当下中国学界的一种自我救赎的使命,在笔者看来,提升学术道德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按照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观点,道德的进化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即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与原则的道德。罗尔斯的观点原意是论证个人道德形成与发展的演化轨迹。其实,学术道德只是道德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子系统,只要稍加结构改造,我们就可以把该模型运用到学术道德的建设上来。

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每个人最初获得的学术道德规范都来自于对权威道德的认同与模仿,这个人在微观层面形成学术道德的起点,权威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坐标。那么,权威的道德体现在哪里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权威展现给共同体是一种信念伦理,即权威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基于美德的信念,这种信念点亮了每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内心的美德之灯,这是在个人层面提升学术道德的关键环节。

对于学术共同体成员来讲,更为重要的却是科研活动中的学术道德建设问题,此时,就进入了社团的道德,即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规范。

在学术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学术道德就是职业伦理,换言之,在共同体内要遵守各自领域的职业伦理,这是共同体得以维系与运转的底线。如果学术共同体失去了职业伦理,那么该群体将出现严重的行为失范。当下中国学术界遭遇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学术界的普遍失范现象。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维系社会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即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如今专家系统的声音已经被严重透支,接近破产边缘,究其原因就是个别专家为了己一己私利或者迫于各种压力,违背了基本的职业伦理造成的结果。所谓象征标志,即具有合法授权的机构由于违背最低职业伦理,同样面临信誉破产境地。由此可见,共同体的学术道德必须基于职业伦理之上。提升学术道德的最高级别就是制度层面的道德,也就是原则的道德阶段。

我们可以把原则看成各类政策制定的道德基础,而具体政策则是特定制度目标的体现,那么,一个背离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目标,必定带来公共利益与价值观的重新调整。基于常识,好政策让遵守规则的收益最大化,反之亦然,坏政策则让不遵守规则的收益最大化。也许由此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群体认知模式与价值观的扭曲。在我们这样的功利主义掺杂着实用主义的文化氛围内,所有原则的设定在表层都沦为对行为的成本—收益的考量,一旦目标的美好成为掩盖手段残酷的一种技巧,就会出现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谓的糟糕的情形:利益的政治,而非原则的政治。而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一项政策不能轻易触碰的伦理底线。

因此,当下提升学术道德的模式无非三种:强化权威的道德、严格践行社团的道德规范,或者直接捍卫原则的道德。哪种模式更有效呢?前两种模式我们已经运行了很多年,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责任错置:权威的道德中缺少指引性的信念伦理要素,而社团的道德则缺少实质性的责任伦理行动。解决之道就在于,使原则的道德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否则,其他两种途径再怎么片面努力,学术道德终究会被原则的不道德所吞噬。毕竟理性的人不会忍受遵守学术道德总是吃亏的现实,而这一切必须通过原则的道德来保证。所以,理解各层次学术道德的核心主旨,恰恰是重建学术道德的基础性工作。正如英国哲学家彼得·温奇所言:理解意味着意义,而意义意味着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规则。